

南开大学政治学学术丛书

政治學

POLITICS SERIES

# 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

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  
政治文化分析

杨妍 著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 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

——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

杨 妍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间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  
分析/杨妍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01-05594-7

I. 地… II. 杨… III. 政治—文化—研究—中国—民国  
IV. 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472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3,000

定 价:22.00 元



杨妍，1979年12月生，云南人，2006年获得南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政治学专业，政治文化方向），2007年获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政治文化的研究工作。

#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	(24)
第一节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国家认同	(24)
第二节 作为政治文化的地域主义	(40)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	(44)
第四节 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	(57)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多元国家认同与省籍意识	(68)
第一节 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结构	(69)
第二节 从华夏中心主义到多元化认同的转变	(77)
第三节 多元认同时期省籍意识的兴起	(88)
第三章 清末民初省籍意识的发展	(100)
第一节 地域意识与省籍政治情感	(101)
第二节 公共空间的扩展与省籍意识的发展	(120)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省籍意识的发展	(127)
第四节 联邦制理论中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 矛盾与平衡	(136)
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省籍意识的制度环境	(151)
第一节 民国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	(152)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省的地位及制度的 变革	(162)

第三节	省制变化对省籍意识及国家认同的影响·····	(177)
第五章	联省自治运动中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 互动关系·····	(183)
第一节	联省自治运动与省籍意识的高涨·····	(184)
第二节	省宪运动与省籍意识的全面觉醒·····	(210)
第三节	联省自治运动中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 互动·····	(226)
第六章	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现代启示及 发展·····	(240)
第一节	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互动的失败及其现代 启示·····	(241)
第二节	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影响·····	(253)
第三节	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公民文化的 建构·····	(260)
结 语	·····	(269)
参考文献	·····	(275)
后 记	·····	(290)

# 绪 论

## 一、选题的意义

国家认同问题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从地域意识(regional identity)与整体国家认同的关系出发是研究认同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本书将民国初期的省籍意识界定为地域主义,并将其放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认同建构的背景下对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研究。

省原是“行中书省”或“行尚书省”的简称,意为朝廷行政中枢的临时派出机构,其历史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但是成为地方最高官府是从元朝开始的。自元创设行省制后,省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中充当了集权与分权的枢纽。<sup>①</sup>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省域范围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结构、特殊的行为模式和文化同质性,从而使社会成员产生了对本省的从属意识。这种意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表现有所表现。例如,自元代开始,科举制中就有按省区分配名额的规定,政治力量对比中形成了以省为单位的冲突。明朝党争中出现了以省籍为派系的斗争等等。但

---

<sup>①</sup> 参见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省籍意识始终被视为与大一统相对立的地方主义,也不可能与国家认同发生联系。清末民初时期,省已由中央派出机构演化成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在清末新政、地方督抚权力的扩张、省谘议局的设立及士绅权力的上升等因素影响下,省籍意识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会心理和认同逐渐兴起,成为民初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文化。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主义,省籍意识与现代国家认同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也是一个逐步纳入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国本身也经历着从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随着帝制体系的崩溃和现代化的启动与展开,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的国家认同体系逐渐趋于瓦解,以主权、民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观念及民主政治意识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新资源。认同资源的转化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来实现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推动国家认同由观念符号进入到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清王朝的解体以及辛亥革命中各省区地方政治势力的强化,形成了国家认同资源转化与中央权力衰落的矛盾。在此情况下,由于政治重心下移到省一级,省区内的士绅等政治力量借助于地域认同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的认同资源,促进了省籍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省籍意识的兴起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认同意识由乡土宗族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在中央权威衰弱的情况下由地方新兴势力通过省区的发展来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结果。省籍意识的发展不是由国家退到省,而是由乡土社会上升到现代国家的一个中介,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建构国家认同的一个路径选择。

省籍意识的发展与地方政治制度的变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有着紧密联系。作为一种由规则所构成的秩序,省制的



变化会对地域观念、国家认同产生影响,构成了省籍意识发展的制度环境,同时省籍意识的发展也是促进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省籍意识的作用下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其自主性逐渐增强,突破了君主专制政治下地方政府作为王权附属物的思想和模式,促进了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建立。在此期间,省籍意识的高涨是促进单一制与联邦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问题讨论的重要因素。这些讨论是以现代政治思维为基础,将制度设计和权力配置问题置于民主共和体制之中进行研究,因此是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和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从辛亥革命到洪宪帝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轨迹是,省区的独立促进了地方分权,而现代化及国家建设的任务又推动着中央集权浮出水面。由于袁世凯的过度集权及帝制的复辟与共和宪政相违背,激起地域主义的再次兴起,致使省籍意识在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再度高涨。随着中央权力的更迭及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央路线失去了人心,省区自治重新成为国家建构的选择途径,这一趋势导出了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如火如荼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提出宪政与共和的制度变革方案后,联省自治运动把目标设定为联邦主义共和制,并将重心从中央权力层面转向地方与基层的制度变革,以省为单位的自治为联邦制找到了具体的操作载体,并通过省宪运动和国宪运动形成了省区自治与国家宪政建设的双向互动,使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宪政、共和、联邦主义与地方自治的逻辑展开。联省自治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省籍意识的全面觉醒,也是联邦制度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及国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以省籍意识为基础建构国家认同的途径以及联邦制国家模式的尝试最终被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是省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以及省籍意识的形成对以后政治制度的选择和演进以及现代国家的建构均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兴起是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相一致的。起先省籍意识是作为与封建中央政权对抗的工具而存在的,随着现代民主观念的进一步传播,民主、自治、自决、联邦等理论为省籍意识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论证。省籍意识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政治情感,这种情感是在地缘、宗族等自然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社会整合机制的转变、地域空间的扩展以及政治事件等因素的推动,省籍意识从一种地域政治情感向理性的政治态度发展。其后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省籍意识从政治态度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政治理想和政治纲领并付诸实际政治行动的政治信仰。正是省籍意识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提升,为省区自治及联邦制的实践奠定了心理基础。联省自治运动是具有民主色彩的政治运动,其目标是要实现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转型,走与美国相类似的联邦主义道路。其实施方案是先实现各省自治,并在此基础上由自治省联合组成联邦政府。省区自治、省宪的制定与联治政府组建运动的同时展开促进了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双重发展,形成了省籍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一次短暂互动。但是由于联邦制制度选择的约束性和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互动机制的缺失,这一互动终究归于失败。民初省籍意识的发展及其与国家认同互动的失败,证明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不是同步进行的。这种非均衡性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除了推进国家一体化之外,还要通过政治发展推进民主化建设,实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因此民主化进程也是现代国家认同发展的过程。在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

公民文化的培育,为实现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的互动提供社会空间和主体性支持。

省籍意识作为一种地域主义,其产生与发展对省级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有着很大影响。自清末改革省制,正式以省为地方区划最高单位,省与中央之关系、大省区小省区的问题就一直成为争议问题。省与中央的权力冲突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冲突的核心,省籍意识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省的区划范围、制度设置等问题的政治文化基础。在区域较大的国家里,由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共同体区域间发展通常处于不平衡状况,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状态下协调好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建构现代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础。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分析

### 1. 国家认同的概念和理论

国家认同是由英文的“national identity”翻译而来,在英文中“国家”可译为“state”和“nation”,“state”表示由一定地域所组成的政治单位,包含着一定的领土和定居的居民,但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主权,在政治地理学中“state”也可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单元,如邦和州。<sup>①</sup>“nation”一词最初从拉丁文“natio”衍生而来,指占有—定空间的居民,这些居民因为实际地或是想象地具有同一血缘等因素而具有统一意识。可以说“state”强调的是国家的政治主权,而“nation”则偏重于共同意识的形成。国家本

<sup>①</sup> 参见王恩涌等主编:《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我们通常用国家指涉一切政治共同体,它可以笼统地包括城邦、帝国、王朝以及近代国家。狭义的国家专门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国家形式,即“nation - state”。本文所讨论的国家认同沿用广义的国家概念。在英文中“nation”一词可以译为国家也可译为民族,有学者认为当一个民族以追求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为明确政治目标时,“nation”可以理解成国族,“national identity”即可译为国家认同也可译为国族认同,而国族可以涵盖民族与国家两层意思。笔者认为,因为民族并不必然是带有建国意图的集体人群,而现代国家也不必然预设民族基础的统一性,过分强调民族意义,有可能模糊了现代国家对于国民性的规定,同时也刻意压缩了国家认同的建构空间,因此本书使用国家认同的提法。1990年以来,“认同”一词在中国的出现频率迅速增高,甚至俨然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作品的时代标志。“认同”是社会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之一,其名词形式是“identity”,指涉身份、属性,将“identity”演绎为认同一词则有归属感的含义。带有动态含义的词型是“identification”,意指“我者”与“他者”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认同,即认为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还是对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认同问题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问题,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和层次的研究。

认同首先是作为哲学和逻辑问题在中国出现的。在《中国对国民认同的求索》(*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美国学者考证了“认同”一词在中国最早来源于哲学里的逻辑公

式,即当两个事物相同时“甲等于乙”的同一律公式。<sup>①</sup>“identity”在哲学研究中被译为“同一性”,关于同一性的通常定义是莱布尼兹提出的:如果属于某个东西的所有性质都属于另一个东西,或者说以一个代替另一个而不改变任何命题的真值,则它们是同一的。逻辑学中的同一律表明,承认事物的同一性是我们能够讨论任何事情的前提,而一个事物是自身同一的,它就必须能够经历所有可能的变化而仍然保持其同样的唯一性(the sameness in its singleness)。在哲学里“identity”讲的是同一事物在变化中的同态和差别中的同一问题。

认同其次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最早把“认同”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进行讨论的是弗洛伊德,他认为,“认同是与一个客观对象形成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者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sup>②</sup>。后弗洛伊德学派的埃里克森(Erick H. Erikson)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认同。精神分析家探讨个人认同以此回答“我是谁”的问题,集体认同则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可见认同是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用来研究自我发展过程的关键概念,它指个人与外界的对象之间产生心理上、情感上的结合关系,并通过心理的内摄作用将外界对象包容到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心理学分析手段凸显了认同的观念主义性质。

认同再次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英国 Bristol 大学的塔弗尔

---

<sup>①</sup> Dittmer &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

<sup>②</sup> 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in J. Strachey,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Hogarth Press, 1921, Vol. 18, pp. 107 - 108.

(Tajfel)最先引入社会认同的概念,<sup>①</sup>认为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认识,这一认识伴随着他在该群体的成员资格或身份的情绪与价值意义。可见在社会学研究中认同的观念是和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这个视角下,认同被看成是依赖于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一些位置的变量。认同是自我意识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代表了对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的认识。离开了作为成员身份的群体,认同就不可能存在。同时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团体的基础是鼓励成员积极联系的各种观念,观念既可以直接体现在成员间的话语体系和他们交往、沟通的方式中,也可以间接体现在共有的象征、符号和标志中。这些观念使该团体区别于其他群体,使成员感觉到他们具有与其他群体不同的集体身份或属性。<sup>②</sup>集体认同是这些观念的总和。认同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归属于某个群体的精神纽带以及作为“我者”对立面存在的“他者”。

在对认同概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我们来看有关国家认同的概念。国家认同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行为科学革命时期,主要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政治整合以及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sup>③</sup>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国家的演进及现状,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国家建立等问题时使用了国家认同的概念。对国家认同的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中国台湾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

---

<sup>①</sup> 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4, pp. 65 - 93.

<sup>②</sup> Martin Marcussen, Tomas Risse, Daniela Engelmann-Martin, Hans Joachim Knopf and Klaus Roscher, "Constructing Europe? The Evolution of Nation-state Identities," in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ck Jorgensen, and Antje Wiener, et a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SAGE Publication, 2001, p. 102.

<sup>③</sup> 参见袁鹤龄:《国家认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台湾的国家认同》,载《理论与政策》(中国台湾),1998年第2期

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并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sup>①</sup>“国家认同是民族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它是一种可以把民族国家的福祉看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或社会哲学的信条。它也是一种可以使各个社会得以紧密结合,并使权威得以合法化的政治信条。”<sup>②</sup>日本学者韦高邦雄提出,国家认同是使某一团体和组织体的成员不仅在形式上隶属于此一团体,而且在心理上 also 认为该团体是自己的团体,明确意识到自己是该团体的一分子的意识。新加坡学者崔贵强认为:“国家认同即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个人把国家作为效忠的对象,因此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sup>③</sup>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是“每个人认为各个个人均应向民族国家效其最高的世俗的忠诚的一种心态,它最重视民族国家,不仅把民族国家视为理想的自然和正常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活动不可或缺的架构”。综上所述,我们根据国家的对外与对内的属性,可以从两个层面概括国家认同。在对外方面,对国家来说只有保持其独特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得到他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家才能得以存续。因此,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环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在对内方面,国家的存在除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外,还必须获得主权范围内成

<sup>①</sup>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湾),1998年,第9~12页。

<sup>②</sup> 王曾才:《中国的国家认同与现代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中国台湾,1994年版,第201页。

<sup>③</sup> 崔贵强:《新加坡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85页。

员的认同,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指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情感上的结合,对国家的合理性表现出无上忠诚,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对国家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和政治过程等方面的理解、赞同、支持和追随。本书仅就这一层次的国家认同进行讨论。

## 2. 国家认同理论的主要流派<sup>①</sup>

对于国家认同理论,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即民族主义流派与自由主义流派。这两种理论在国家认同的含义、国家认同的意义以及国家认同的基础等问题上均有不同见解。

民族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有埃瑞斯特(Gellner Erest)<sup>②</sup>、安德森·本尼迪克特(Anderson Benedict)<sup>③</sup>和史密斯安东尼(Smith Anthony)<sup>④</sup>等。民族主义流派认为国家是维护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而认同是个别成员认清自己所属脉络从而产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在对国家的形成问题上他们都强调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格,例如,埃瑞斯特认为,现代国家是在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变迁中为了确立“高级文化”的持续扩散,从而产生的现代政治组织形态,因此民族和民族主义都必然出现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化之后的国家秩序中。而安德森·本尼迪克特则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中来解释民族国家的起源,并将民族国家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

<sup>①</sup> 下文关于国家认同理论的分类及内容参见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sup>②</sup> Gellner Er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③</sup>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91.

<sup>④</sup> Smith Anthony, *National Identity*,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主义流派者眼中“国家”一词代表了不同强弱程度的民族承载，国家这种新兴的政治文化组织实际上既是“国”也是“族”，所以“national identity”可以理解为国族认同。他们认为，在各种群居生活中，国族是位置最高、道德作用最大的群体，国族范围内的个人把民族国家看作最高层级共同体而且是个人幸福的最终保障，正是确认了民族国家对自我实现的关键性意义，才形成了国家认同。民族是国家的基础，而族群是意识到自己拥有与其他群体不同的历史记忆、发源神话、生活文化与居息家园的人群，因此国族认同是认同于自身生命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包括血缘、种姓、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等。由于这些基础都属于过去，所以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在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首先，国族的成员要视其他成员为同胞，并且相信他们之间有某种相关的特质，也就是说民族成员是相互承认且分享共同信念的人。其次，国家认同被视为是具有历史连续性背景的过程。历史连续性即指大家被事实地或者想象地建构成拥有共同的过去和历史。再次，国家认同是一种能发生主动行为的认同。这种主动行为表现于整个民族的决定、共同的行动以及共同的成就等等。其他群体不具备能动性只有被动认同，唯有民族能透过其决定与行动展现能动性。最后，因为国家是在特定领域上行使正当权威的组织，如果一个民族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主权国家，民族与国家两个范畴才能结合成民族国家。因此认同的形成要求一群人定居于固定的领土上，即国族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家园。这几点构成了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形成过程的要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都是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它在处理国家认同与其他集体认同的关系时首先肯定国家认同的道德优先性，并认为其他的集体认同